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重大问题

高培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学时代命题。经济学界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针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入的经济思考，努力给予系统回答。

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历程便不难发现，中国既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也没有套用西方模式，而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存在于中国道路中，只能到中国经济建设实践里去寻找。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进行理性分析和规律性总结，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讲清楚，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学者致力于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研究做得还不够好。不仅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努力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

首先要梳理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在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近4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史料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从中提炼出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来龙去脉讲清楚、讲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轨迹为线索，从历史分析出发得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概括。

再次要提炼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因此，在梳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将这些实践和经验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作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

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构成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三部曲。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好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解释。其中，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给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是一条主线，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

从需求看，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新时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上层次”，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上，就是人们对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是“扩范围”，即日益扩大的多方面需要。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就是人们对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进一步看，“上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也好，“扩范围”的制度政策产品也要，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又可区分为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市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进一步表述为对主要由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与对主要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要。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产品到制度政策产品，从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系统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政府系统，是我们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经济学解释的主要观察点。

从供给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联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交织，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生产力共存，生产力布局不均衡。其二，制度和政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社会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

设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等。进一步看，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制度和政策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可以区分为通过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通过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市场系统应负主要责任。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政府系统应负主要责任。也就是说，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是市场系统还是政府系统，均负有解决或纠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责任；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

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必须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改善供给，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这带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要通过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次，厘清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的责任。第三，找到构建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体制机制的通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隐藏的客观经济规律。第五，正确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提高发展质量、注重抓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五方面问题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为建设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将其视为跨越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关口的迫切要求，还是将其定位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理念、思路 and 战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的调整是宏观调控体系的调整。宏观调控体系调整的主线和方向，就是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而非一般意义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作出的调整而非根据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是短期的，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是延伸到宏观经济理论层面。因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给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分析视角变化。过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当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形势分析的聚焦点自然要转到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

发展理念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快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唯一标尺，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带来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既然发展理念已经发生变化，GDP增速便不再是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标尺，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便不再是优先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将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主线变化。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作用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在于供给，基本出发点是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调控，但主攻方向已让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不再是主要选项；其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周期性波动和

供求总量失衡仍属调控范围，但重大结构性失衡才是调控重点。

实施途径变化。过去，宏观调控主要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则需要将实施途径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依托于改革性行动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要防止在宏观调控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扎扎实实深化理论研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实践成果上，而且表现在理论成果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大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架构，二要有足够的构件。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就架构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相呼应、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进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以之指导经济研究工作。

就构件来说，改革开放近40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对这些丰富实践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件。对这些基本构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普遍意义的新规律，就能构建起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应有贡献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金融学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机遇

刘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快速发展，创新举措层出不穷。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为经济长期繁荣提供必需资金，也为中国金融学发展提供丰富研究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金融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交汇在一起，在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对金融学研究提出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带来激动人心的理论创新机遇。

定义并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高质量金融。金融的本质是把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以简单、直接、透明、有效的方式连接起来，服务实体经济。长期以来，受“金融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深化理论影响，不断扩大金融资产规模被普遍认为是发展金融、繁荣经济的必然途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金脱实向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反复提醒我们，更多的金融并不意味着更好的金融，规模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例如，增加的货币供给及攀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也可体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但这种规模扩大如果超出合理限度，就会破坏经济发展。又如，实体经济以产融结合之由大举进军金融业也能带来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大，但这不仅会加剧金融领域的低质竞争，致使金融中介效率低下，而且会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金融服务覆盖是否广泛、金融中介是否有效率等才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指标。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学研究应深入回答以下问题：我国合理的金融规模是多大？什么样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更有利于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怎样把金融业附加值占GDP的比例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产业和金融结合的适当边界在哪里？等等。

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除了融资，金融体系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价格发现，即提供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金融资产风险水平的统一价。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价定律。如果违背一价定律，就会产生套利或寻租机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发展阶段等原因，违背一价定律的现象在我国还大量存在，由此带来一些寻租行为和金融乱象。例如，刚性兑付或者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风险溢价不能得到合理估值，这些机构乐于通过不断融资来实现规模上的突破。这不仅降低投资效率、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而且使得我国迟迟不能形成市场化的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给风险资产定价的“锚”；上市公司“壳”价值的存在，同一企业A股和H股价格的背离，也都是对一价定律的违背。梳理林林总总的违背一价定律的现象，找到消除它们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将为金融学提供众多重要研究课题。再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建立信任成本高昂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消费金融面临的最大瓶颈。金融如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科技深度融合，大幅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迫切需要金融学研究去突破。

提炼独具特色的中国金融实践经验，构建辐射世界的中国金融理论。过去40年，我国金融领域改革者和实践者不囿于陈规俗见的约束，创造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例如，以开发性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实践，通过对国家信用的证券化来获得资金，以保本微利为目标，采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国家战略；在金融不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采取进退有据的金融开放策略，建立审慎的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健驾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外开放和减少资本管制这三驾马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在经济发展早期资本严重缺乏时，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的未来收益“证券化”，以房地产投资和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独具特色的金融实践既符合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特点，又蕴含现代金融学的激励相容理论和通过证券化实现价值的跨时空交换等智慧。提炼这些金融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对我国金融学研究来说，不仅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破解公平与效率难题的中国创造

冯根福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化解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公平与效率这个人类经济发展难题。

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公平。公有制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有企业。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坚强领导，不仅可以保障党的宗旨和经济公平要求在国有企业贯彻落实，而且可以将企业经营目标、员工利益同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促进实现经济公平。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可以避免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我国非公有制的经济特点也有助于实现经济公平。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党和国家的鼓励、支持、引导下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具有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经济公平要求的素质。

另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效提高经济效率。这一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主体多样化。经济主体多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和经济竞争可以保障经济主体充满活力，促使其不断提高经济效率。这也是中国能创造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根本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有效破解公平与效率的难题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超越了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之相适应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率低下和商品短缺。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分配的平均主义，从而使公平与效率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创建的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